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学生成长百卷读本一

(100)海外人看中国

 **eBOOK**
内网资料 非卖品

飞机与电话

一位芬兰学生在来华前曾接触过一些中国人，在他的头脑里，中国人是和好学、向上、勤奋、礼貌、刻苦这些字眼连在一起的。因此，他想，到中国来留学会是愉快的。

K 学生怀着一种美好的感觉来到中国。但是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便发现，自己并不真正认识中国人，生活在他的祖国的中国人和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相差如此之大。

生活习惯先不说，单是行为举止，就使 K 深有感受。他说，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是那样彬彬有礼，举止文雅得体，而中国国内的人却普遍没有礼貌。

就从中国民航的飞机说起，K 抱怨他们的服务水平太差；空中小姐的英语水平不过关，无法好好交流；飞机误点等等。据 K 说，有很多留学生坐了一次中国的飞机，便不愿再坐第二次了，他说他也一样。

但这位芬兰学生对中国的美好感觉并未因飞机上的经历而改变，他还是带着喜悦的心情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一下飞机，他便习惯地向在机场内遇见的每一位服务人微笑着道一声“你好”。这在芬兰，是很平常的事。然而，在中国，K 学生发现，他的问候时常得不到同样的回报。大多数人是一愣，然后不自然地向他点点头。有的人则茫然地看着他，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K 在中国有几个老朋友，假日小聚必然是少不了的，但他在电话联络朋友们时第一个发现就是电话总机小姐经常不在岗，他想打一个电话经常要等很长的时间。即使小姐拿起听筒了，耳边响起的也是冷冰冰、拒人千里之外的两字：“要哪？”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K 一愣，他原先已到了嘴边的那句“您好”即被噎了回去，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了。总机小姐却不会发愣，紧接着的话把 K 的情绪进一步推向深渊，她的声调提高了八度，说：“说话呀，干嘛哪？”K 感觉到一股冰从脚底直窜向脑门，他重重地坐到沙发上，听到总机小姐叫道：“神经病！再捣乱就叫保卫了！”电话便被无情地挂断了。

坐在沙发上的 K 好半天才缓过劲儿来，那天他没有再打电话，许多天内他都没有勇气再打电话。一个星期后，K 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预先在头脑里将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排演。然后鼓足了勇气拿起听筒。

这天，K 整整等了 10 分钟才等到总机小姐接起听筒，小姐那“要哪”二字刚出口，K 使用不熟练的汉语飞快地说：“要外线！”

后来当 K 再说起电话时，总是调侃地微笑着摇摇头，对此，一个“老外”已见怪不怪了。

企业里的青年人

K 在一家企业中找了份“打工”的工作，他发现，企业里的中国青年出奇地懒散。

在他工作的部门里，经理有一位女秘书。这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外语相当好，但就是太爱美了。每天早晨，她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拿出一套煎饼果子吃。K 无法理解一个雇员如此大模大样地在上班时间吃早餐，而老板却视而不见，吃过早点，她抹抹嘴，便开始精心地打扮自己，那副仿佛等待约会的神态真让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如果是在芬兰，他知道，这个女孩子会被立即开除。

K 想自己应对聘用他的企业负责，便向另一位已在这里工作许久的外国

“中国人都这样，你没地方去举报，不会有人管她。如果哪个中国人工作太认真，他会被孤立的。”这些话让K听得迷迷糊糊，怎么也搞不懂。不过他还是很很快发现，这家中国现代化大企业里，几乎所有的青年都是一种萎靡不振的工作状态。

中午休息时，青年们或是几个凑在一起打扑克，或是各自在电脑前玩电子游戏。这些电脑都是工作用的电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消耗，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感染病毒，是绝不应该用来玩电子游戏的。K对此无法视而不见，他没有听另外一个外国朋友的劝告，直接找到总经理，反映了这一情况。总经理听后，对他说：“谢谢你，我一定严办。”K很高兴，转过身来便告诉了那位反对他“举报”的外国专家，那人只是无奈地苦笑着摇了摇头。K等着总经理采取行动，或是开除那些员工，至少是扣发工资、点名批评，但，一个星期过去了，他没有等来任何结果。相反，他却听说，总经理办公桌上的电脑里也有一种叫做“三国演义”的台湾版电子游戏。K似乎明白了什么……

K不能不忆起那些在芬兰学习的中国青年，相比之下，他觉得，那些青年真是中国人中最伟大的人。他的中学里有一个叫赵翔的中国学生，刚到芬兰时英语是全班最差的学生，但仅三个月后，他便可以流利地和班上同学交谈了。有一天，K在校园里看到了赵翔，他正一手拿着汉堡吃，一边捧着一本英文书。因此，K也一直认为中国人都是这样的，怎么会想到，同是中国人，在中国国内却是这样一副样子。

就在下班打游戏事件一个月后，他所在的中国企业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因为负责接传真的小姐缺岗，一份重要的文件未能及时传进来，致使企业至少损失几十万元的外汇。传真机原来是可以接通自动接收装置的，但不知什么时候被关上了。事后查明，那位负责管传真机的小姐去一间空闲的房间玩电子游戏去了。进一步追查，原来那空房间一直未空，企业里好玩电子游戏又等不到中午休息时间的小青年们经常在工作时间偷偷拿一台便携式电脑躲到那里玩上一整天。现代化的设备在这家企业里被派上了如此的用场。

由于造成的损失太大，那位传真小姐被停发全年奖金，扣除当月工资，但与开除无缘。K认为处理得还太轻，但他已学会不再轻易表态了。

周围的议论

J是一个美国留学生，他今年26岁，10年前便跟着从事翻译工作的父母来到了中国，他刚刚踏上中国，便爱上了这片土地。

当问到他“中国使你感觉最快乐的是什么，使你最不快乐的是什么”问这个问题时，他沉吟了片刻，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说，因为涉及到了我的个人隐私。”

但最后他还是回答了这个问题。J说：“我最快乐的是在中国遇到了一位可爱的姑娘，最不快乐的是在我爱她的同时，还要承受社会强加给我的其他东西……”

J具有美国人性情活跃的特点，喜欢探求一切未知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不仅仅在自己学习的学校里了解着中国，还寻找并创造着一些机会走进中国人的家庭，走进中国人自己的生活圈子，去了解最真实的中国和中国人。他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爱也便随着他对其了解的加深而加深了。

J身边有许多女孩子，他经常对人说，只要身边布满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一整天的情绪就有保证，学习工作起来才有劲儿。他的宿舍里便放着一本相册，里面都是这些中国女孩子的玉照。

J的这种举止并不是能够被每一个中国人理解的，尤其是他学校中的同学。在学校里，围绕着他的议论偶尔能够被他所听到。可J不以为然，一个美国人是不会在意别人怎样议论他的。J认为自己与这些女孩子的交往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谁不爱美呢？年轻、漂亮的女性是美中之至美！”他这样说。

对于周围的一些议论，他曾对自己要好的中国同学说：“你们中国人对异性关系实在是过于敏感了，看到一男一女交往多一些便要产生联想，尤其是对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总以为很多外国人会利用自己的身份，干一些不好的事情。他们虽然不理解我，可我理解他们。”

J果然遇到一位理解他的中国人，他姓蓝，是一位年近50的中年人，一个很偶然的的机会，他们成了好朋友。蓝是一家合资企业的中方副总经理，也许因为职业的关系吧，他才能理解J。J经常出入于蓝家，蓝的女儿蓝眉也自然地成了他的“干妹”。

J成了蓝眉最好的英文教师，闲暇的傍晚，蓝眉会到J住的宿舍用英文与J侃上几个小时，在假日里，J也常约请蓝眉陪他在这座城市里逛上一整天。他们几乎每周都要见上一两面。

故事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

被禁止的恋爱

从J认识蓝眉起，已经过去了6、7年，不知不觉间，他的小干妹已从一个12岁的少女长成了一个22岁的女青年，已成人的蓝眉楚楚动人，风姿绰约。J有时便开玩笑地对蓝副总经理说：“你要是不看紧你的女儿，我可要舍命去追她了。”这时，蓝会笑着说：“那时你得先叫我一声爸爸。”说罢，两个朋友击掌大笑。直到有那么一天，J感觉自己的情感真的起了某种变化。

那是一个夏天，长江三峡的“告别游”正如火如荼，J早已在来中国的第二年便去过了，在他的鼓动下，蓝眉也约了女伴，在这年的夏天里去了趟三峡。蓝眉前后去了两星期，从第二个星期起，J每天晚上都泡在蓝家。他

他才能略感欣慰。

也就从那时起，J发现，自己爱上蓝眉了。

一个美国人不会对爱上一个原本当妹妹看待的女孩子而不安。他所不安的是，一个刚刚十几岁的中国女孩子能否接受一份从兄妹感情转化而成的爱情。与J交往的女孩子很多，但他从没对哪个女孩子产生过非份之想，除了喜爱，也没有过其他的感情。甚至于，当有一个女孩子向他表示爱慕时，J坚决地拒绝了。浪漫的美国人也不是见一个爱一个的。然而，这一次，J知道自己真的是恋爱了。

J在蓝眉回来的当天就对她讲了自己的发现，他当时看着蓝眉的双眼，一字一句地用中文“你相信吗？我发现，我爱上了你。”

蓝眉先是一愣，继而泪水夺眶而出。不再需要过多的言语，J一把将蓝眉揽在了怀里。J听到小鸟依人的蓝眉在自己的怀中带着哭腔说：“我早就爱上你了……”

一个月后，蓝眉和J一起坐在了蓝眉的父亲、J的中国挚友蓝副总经理的面前。

蓝眉说：“爸爸，我决定嫁他了。”

J说：“老朋友，我决定叫你一声爸爸。”

蓝副总经理好久没有说出话来……

第二天，当蓝眉哭着告诉J“爸爸不同意我和你的事”时，J发现，自己对中国人的了解还是太少太少了。

以后，J发现自己与蓝多年的朋友关系不复存在了，当他们偶然遇见时，蓝没有像往常那样亲热地叫他一声“吉姆小子”，而当J向他点头致意时，蓝一侧身，走了过去。

J无法理解这一切。

J与蓝眉的关系仍在发展着，炽热的爱情在两人心中涌动着。他们公开了恋爱关系，经常成双成对地出入公共场所。J在学校里所听到的议论更多了。但他不在意这些，面对周围的压力，他甚至于产生一种快感，这种反抗的快乐只属于西方人。

让J无法忍受的是眼看着蓝眉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俩的事传到了她的学校，各种风言风语传播的速度是惊人的。什么“看上老外的钱了”、“平时看她挺老实，原来这么有心计”、“漂亮女孩儿就是会‘钓鱼’”……虽然蓝眉毫不在意，然而，J看出，她明显地变得憔悴了。

J没有问过蓝眉为什么爱自己，美国人不习惯于这个被中国的恋人们千百次地重复的问题。倒是蓝眉不只一次地对他表白自己的爱恋，她爱他思想的深邃，爱他的开朗活泼，爱他的热情、浪漫，更爱他身上的那股青春朝气。J身上所携带的不仅仅是属于他自己的品性，而是西方人共同具有的品性，而这种西方的风格，对蓝眉这样的女孩子是充满诱惑力的。

从J这方面他爱蓝眉的清纯与纯情，爱她的典雅与端庄，爱她的美丽与青春……我们不妨说，J同蓝眉一样，爱的也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这个人身上所容纳的异国情调。蓝眉无疑是东方女子的典型代表，一个爱上中国的西方人不可能不爱上中国的女孩子。

J与蓝眉的故事还在继续着，蓝副总经理仍然坚持反对的立场。他们在争取，在等待，同时也在享受着他们的爱情。

为什么我们不能住旅馆

彼德是一个 20 多岁的英国青年，在天津师范大学留学。他身材高挑，面庞白细，很文雅。

彼德已来中国一年多了，他在英国时便开始学习汉语，所以一般的中文会话不成问题。他说汉语时讲得很慢，一字一顿，但很清楚。当他讲到激动时，便会不由自主地改成英语了。

他曾经讲述过自己一次旅行的特殊经历。

在彼德的心里，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有许多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游览胜地。在他来中国前，就曾下决心，要走遍中国所有的名胜古迹。所以，来天津不久，彼德便计划着到各个城市走一走、看一看。天津的旅游点不多，天津以外的旅游区却很多。于是他首先想到了北京和西安，北京有长城、故宫而西安有兵马俑，都是世界奇迹。

第一学年的暑假，彼德和朋友们相约一起出游，先去北京，再去西安。从天津去北京很顺利，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在北京他们玩了许多地方，那些地方风景都很美，但一些经历却让彼德很不愉快。

彼德一行人下火车之后，决定先找一家旅馆住下来。火车站出站口便有许多旅馆在招徕顾客，他们过去一看，价钱还比较便宜，便用中国话对那位招徕顾客的小姐说：“我们，跟你走。”

她看了看他们，出乎意料地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

彼德十分不解，问：“为什么？”

她说：“我们不要外国人。”

彼德当时很生气，英国曾有一家旅馆不让黑人住宿，那位黑人以受到歧视为由诉诸法院引起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公众对那家旅馆一片谴责。在中国，白人也要受到歧视吗？

彼德当时很不高兴地对女服务员说：“你们没有权利歧视我们，我们是来贵国学习的学生，我们就是要住在你们旅馆。”那位小姐听后笑了，告诉彼德说，他们误会了，这样做是因为有规定限制她们那儿的旅馆不可以住进外国人。

可彼德还是没完全理解她的话，但知道这是她“上级”的意思，便也不再说什么。于是几个人去找另外的旅馆。但是在火车站，他们问了一家又一家，都被告知不能让外国人住进去。彼德和他的朋友们糊涂了。

幸好其中有位朋友到过北京的大使馆，他们便想先到大使馆，一方面正好有事要办，一方面也可以请他们帮助把住宿的事情解决。他们要了一辆“面的”，告诉司机要去英国大使馆。

“面的”司机拉上他们，开了足有半个小时，左一个弯右一个弯。那位朋友告诉彼德说，他上次来大使馆没坐这么长时间车。

彼德便问司机：“你真的认识大使馆吗？”司机回答：“放心吧，这就到。”彼德他们也知道司机是存心绕远道好多赚钱，但也没有办法，只得听天由命。车开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们才到了大使馆。车费自然贵出许多。

在大使馆，他们了解到，原来中国有规定，外国人必须住在涉外宾馆，不是随便哪个旅馆都可以住的。“难怪火车站前那些招徕顾客的旅馆放着钱不挣呢”彼德想。

但由于涉外宾馆的房租是相当高的，学生是付不起的，于是，大使馆便打电话帮他们联系到一所大学的留学生宿舍，派车送他们去了那儿。

彼德很不理解中国对外国人住宿的规定。在英国，外国人和本国人一样，

是出于对外国人安全的考虑，也有人说，这是对外国人的格外关照。但彼德认为，无论是保护还是关照，都应该建立在对方自愿的基础上。对于彼德来说，这样的“关照”就是束缚。

我们为什么要多付钱

刚在留学生宿舍安顿好，他们就去故宫参观。彼德小时候就见过故宫的照片，一直很向往故宫，这回真要进去参观了，他心情十分激动。然而，买门票的时候，他呆住了。看着售票窗口前立着的牌子，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票价内宾 10 元，外宾 60 元。”为什么外国人竟要付出中国人 6 倍的价钱才可以参观同样一座古建筑。彼德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只是感觉到不公平。

同伴告诉他，在中国这种情况到处都是，每一个名胜古迹甚至于一个小公园，对外国人都要多收几倍于中国人的门票钱。中国人觉得很正常的事情，彼德和他的朋友们却无法接受。如果说因为外国人与中国古建筑无关而多收费，显然说不通；如果说因为外国人比中国人略富裕一些而多收费，也不是每个外国人都有很多钱呀，是不是也有歧视外国人的成份在里面呢？彼德说：“在我们英国，和我到过的所有国家，都没有这种事情，不论是哪国人，都是一视同仁，都可以花同样的钱参观旅游点。而且，在西方人观念里，历史古迹不是属于哪一个具体国家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全人类所共有的。”

必须用外汇

在北京玩了几天后，大家决定去西安。到火车站购票时，吓了他们很大一跳。北京火车站很乱，地上也脏，到处都是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带着包裹躺在地上，东倒西歪的。走进购票处都变得很困难，需要从人群中找出一条缝，一步步地往前挪，生怕会踩到别人。那个场面使彼德想起在电视中看到过的大逃亡的镜头。“天津火车站的情况就比北京好得多，不知道为什么不加治理？”彼德想。

好不容易挤进售票厅，站在了长龙一样的购票队伍的尾巴上，望着前面的长队，大家直发愣。好在他们碰到了一个热心的中国人，他把他们领到了专门的外宾购票处去买票，这使得彼德他们大为感激，并连连道谢。

但在外宾购票处，当他们拿出人民币要买票时，售票员拿眼角扫了一下，冷冷地说：“要外汇。”大家没有外汇，已经都换成人民币了。当彼德向售票员说明这一点时，她仍是冷冷地说：“到银行去换成外币。”

大家感到很气愤，为了买票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不仅如此，一个国家竟然不接受自己本国的货币，这又是一个奇闻了。

列车上的舞会

由于买票时，受到了阻力，彼德和他的朋友没有心情去西安了，他们决定回天津。

回到学校，正好有另外三个同学要去中国的南方旅游，问彼德是否愿意。彼德也想再散散心，四人便决定一同去南方。

他们买的是直达广州的车票，在从天津到广州的列车上，他们过得很愉快，充分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友好。

彼德几位一上车，便引起了乘务员的注意，她们热情地向四位年轻人笑

问他们在中国学习的情况，并亲自给他们倒水。列车长问彼德几个会唱什么歌，可中国歌他们一首也不会。彼德问列车长：“你会唱英文歌吗？”他腼腆地笑笑说：“我只会唱字母歌。”

字母歌谁都会唱，每一个乘务员也会。于是，车厢里响起了“A、B、C、D、E、F、G……”的歌声。彼德后来说：“这首歌我们幼年时便唱过，没想到唱得最高兴、最投入的一次竟然是在中国的列车上。”

唱完歌，列车长又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个小型舞会。”彼德正好带着一个小型录音机，便拿出来，乘务员拿来了一盘舞曲磁带，于是，大家在那狭小的车厢里翩翩起舞了。车厢太小，你挤我，我碰你。于是，大家一对一对地轮着跳。中国的小姐不是很会跳舞，彼德成了她们的老师。车厢里，说笑声和舞曲声交织在一起，气氛真是好极了。

后来彼德对朋友说，那是他在中国度过的最难忘的一天。

亲切的话语

列车到广州后，他们在广州玩了一天，便想去深圳。但没人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去深圳的车票，这时天色已经渐渐变黑了，大家站在路边干着急。他们试图向人们询问，但中文都不好，问了一个人，他听不懂，便不耐烦地摆摆手，走了。这下谁都不敢轻易再找人问。正在焦急时，他们看到一个小个子男人在马路对面观察着这边。一个伙伴说：“会不会是匪徒？”大家都很担心。虽然他们是四个人，他只是一个人，但谁知他会不会突然叫来一帮人洗劫他们呢？

正在这时，那个小个子男人直冲着大家走了过来，大家心理更害怕了，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小个子男人走到他们面前，盯着他们说了一句英语，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场合下，激动得他们都要掉泪了。

小个子男人当时说的那句话是：“Can I help you？”（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这句话在英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得到，但身处异域，身处困境，又身经那许多不快的经历之后，于意外中听到这声音，彼德认为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于是，他们顺利地到了深圳，他说，他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个小个子的中国广州人。

离开广州到深圳后，他们又北上去了江南一些城市旅游。到过无锡、苏州、南京、杭州、绍兴、嘉庆等一些小城市。彼德又有了新的发现，越是小的城市，越是乡村化的城市，民风越是纯朴，人民越是热情好客。

在绍兴，住宿相当便宜，服务也是他们住过的旅馆里最好的。大家每人租了一辆自行车到各处旅游，人们都很友好，主动地向他们喊：“Hello！”相当有礼貌。

有一天雨后，彼德骑车通过一个小水洼的旁边时，正好有一个男人在旁边走过，为了躲闪他，彼德骑进了水洼。彼德没什么事，却溅了旁边人一身泥水。彼德不知所措，没有想到，那个男人却也诚惶诚恐地对他说：“对不起，真是对不起。”

在彼德的想法里，落后的地方的人们文明礼貌水平相对较低，而科技发达、对西方开放时间长的地方的人们应该更懂礼貌。可实际情况似乎刚好相反，这是为什么呢？彼德问自己：是不是人们见的外国人多了，便不再把我们当回事了呢？

我们在中国，却不在中国社会中

艾达是个漂亮的法国女孩子，在天津一所大学里学汉语。她虽然是学习汉语的，但遇到中国朋友时，还是喜欢习惯用英语进行交谈。用她自己的话说，“一个无法进入中国社会的外国人是不会掌握真正的中国语言的”。她对于在中国的生活是这样说的——

我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的周围都是中国人，但我却和中国及中国人相距得很远。我们留学生在中国学习，但我们远远没能走进真正的中国社会。

在留学生宿舍或者班级里，我们这些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可以组成一个小的联合国，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非洲、各种肤色的人都有。这么多人来到中国，为的是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我们组成了一个联合国，这个联合国也就成为一个孤立于中国社会之外的小的社会。我们虽然身处中国，但我们更多的还是与来自我们自己国家或是别的国家的人打交道，而不是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打交道。中国社会是一个很大的社会，我们是一个被划在外面的很小的圈子，脱离社会，觉得很孤单。

这种孤立于中国社会之外的感觉既有学习上的一些原因，也因社交上的事情而起。

就学习而言，我们现在坐在教室里学中文，这和我们在法国国内学中文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之所以来到中国学汉语，目的是为了在国内学好游泳的理论，到中国这个大海里来实践理论，来真正的游泳。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做到。我们也在说汉语，但那是法国人和法国人间的汉语，而不是法国人和中国人间的汉语，离真正的汉语相差很远。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能是真正走入中国社会，多和中国人接触，但这一点实在太难了。

如何才能走进中国社会

我们平时与中国学生接触的机会很少，有个别几个中国学生来找我们接触，但他们都会说英语，他们来的目的是为了练习他们的英语。我们也曾向学校反映，希望帮我们学习汉语，学校也曾为我们组织了一些和中国青年的联谊活动，使我们得到了几次锻炼口语的机会。但是我们发现，这远远不能满足学习的需要。

在西方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外国的留学生进入该国社会都不成为问题。在法国，不论是来自哪里的留学生，都可以租法国公民的房间，住进他们的家里；都可以参加学校里法国学生间的任何一种活动，同样也可以参加法国人能够参加的任何一个社会活动。这些似乎并没有人特意安排，而是很自然地形成的。外来的留学生和法国人之间没有什么区别，这种没有区别的感觉在踏上法国土地的那一天就会感觉到，一个留学生可以把法国当作自己的家。但是在中国，做到这一点却太难了。

在中国，你经历的一切似乎都在提醒你你是一个外国人，走在路上会有人对你格外注意；走进餐馆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转过身来看你；主动和一个中国人打招呼他们立即会神情紧张；没有哪个中国人会想到把自己的房间租给外国人，姑且不管他们是不是有房屋可供出租；在学校里外国留学生也有专门的食堂和宿舍；走在街上，虽然没有几十人围观的场面，但尾随的事情并不少见……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并不少，但中国人似乎普遍有一种对外国人的陌生感和新奇感，他们难以做到对外国人“视而不见”，难以把外国人视作

往往不是“这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而是“这是一个来自外国的人”。进而，中国人便会对之采取一种不同于对本国人采取的态度。

这样将外国人和自己分得很清楚的中国人几乎是中国人的全部，这样便自然形成一种总的社会气氛，那就是将外国人和自己分开社会气氛。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感受到的气氛远比之于文的规则来得更厉害，它称散于学校、商店等各个领域，并且决定着这些领域中的人在任何事情上对外国人所采取的总的行为方针。当一个留学生处于这样一种社会氛围时，他便绝不可能走进这个社会了。这不决定于他自身，也是他个人再多努力都无法改变的。

我的同学中也有试图靠自己的努力走进中国社会的人。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男孩子在一个周末的傍晚勇敢地只身闯入一个中国学生的舞会，当他进去时，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跳舞，呆呆地看着他。舞会出现了至少两分钟的冷场。据说中国最活跃、最西化的人便是大学生，但在大学生的舞会中还会有这样的场面，你可以想象如果那位奥地利男孩子闯入的不是学校舞会，而是社会上的舞厅，将会出现什么场面吗？这位奥地利男孩儿面对众多中国学生的围观并没有感觉尴尬，他是个喜欢冒险的青年。他当时用汉语大声对中国青年说：“我想成为你们的朋友，成为你们中间的一员，请允许我像你们一样参加舞会，我请求你们不要把我当作外国人。”他说完这番话后，等待着学生们的反映，沉默了5秒钟之后，舞厅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响了很长时间。

这位奥地利男孩子从这掌声中受到极大的鼓舞，他知道自己进入中国社会的愿望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就是在那次舞会上，他结识了一个中国女孩儿，他们一起跳了很多支曲子，舞会结束的时候，男孩子约女孩子第二天一起去吃饭。他很怕她会拒绝，但她却答应了。于是，男孩子和女孩子便开始了一段友谊。

这位奥地利同学的经历对我们每个留学生的震动都很大，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并不是一块铁板，它是可以走进的；中国人也不像他们平时表现出来的那样难以接近，他们的心中未尝不想接近外国人，但是似乎很难指望中国人采取主动。西方人无疑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很主动的，但身处异邦为异客，主动进攻的心态不自觉中收敛了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以后，许多同学都试图去主动接近中国人，凭自己的努力进入真正的中国社会。我的一位法国女友和一个中国女孩交上了朋友，她向中国女孩学习古汉语，中国女孩儿则通过和她的接触练习英语，她还到中国女孩儿的家中吃饭，亲自动手包饺子。这无疑是很成功的经历。

法国人以浪漫著称，因此我也将有所举动，在校园里遇到中国人时，我已会主动向其微笑着点头。适合交谈的场合，还会与其攀谈几句。我发现，刚开始以这种出击的方式接触中国人时，他们会一愣，很紧张，但大多很快会变得很热情，甚至诚惶诚恐。

仅仅是一两个星期的时间，留学生楼里的每个同学都行动起来了，十几个人还有了比较固定的中国朋友。这无疑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也许远远不仅是使我们一点点走入中国社会。我们每个同学都被这场革命激励着。

西安公路学院的特色

每年的“五·一”、“十·一”及“元旦”，西安公路学院都要根据不同的节日安排开展各项活动。西安公路学院的老师们认为，这时正是他们进行思想宣传教育，政治上积极影响，提高留学生思想素质的良好时机，也是他们优化留学环境中的软件工程之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五年国庆纪念的日子里，西安公路学院外事处便宴请外国专家、留学生。留学生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身着节日服装，有的拿吉他，有的带来具有民族特色的手鼓，不论新生、老生，还是留管干部，大家载歌载舞，欢聚一堂。他们用歌声歌颂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赞美我们祖国45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直到晚餐会结束，有的留学生还余兴未尽，他们说，西安是他们的第二故乡，西安公路学院就是他们的家，中国的节日就是他们的节日。

为了活跃外国文教专家、留学生的业余生活，增进他们对我国、西安市历史、文化的了解，陕西省教委于1992年组织举办了“外国文教专家、留学生唱中国歌”比赛。他们组织留学生积极参赛、观看，专门带领参赛者去西安音乐学院排练，请教专家，纠正发音。经过认真的准备、激烈的角逐，西安公路学院三名选手获奖。加纳留学生伊马努尔表示要用歌声表达他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他的一曲“奉献”，以其标准的中文发音，圆润、粗犷的嗓音及充满激情的节奏赢得了满堂喝采并夺取了本次比赛的最高分，荣获一等奖。荣获二等奖的选手是西安路院的坦桑尼亚选手玛他比，当他身穿“济公”服，头戴“济公”帽，手拿一把破芭蕉扇随着音节边歌边舞时，一个活灵活现、维妙维肖的“济公”出现了，其充分地表现了“济公”的正直善良、爱打抱不平滑稽可爱，观众都禁不住鼓掌喝彩。西安公路学院的另一名参赛选手是一名一年级的学生，汉语还不流利，通过唱中国歌，汉语得到了提高。由省教委组织的这次活动，受到了留学生的一致好评，有的还提出希望，要求每年多举行几次这样的活动。

通过这次活动，收到了显而易见的效果，达到了宣传中国、宣传陕西的目的，让留学生在活动中亲眼看看，亲耳听听，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 & 艺术性有机地融为一体，进一步了解我国对外开放政策。

为了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西安公路学院组织留学生参加了“西安市第二届启明新华杯跳绳大赛”，平时课余时间，留学生人手一绳，跳单跳、双跳、花步，有的在省跳绳协会老师的指导下扭起了绳秧歌。经过选拔，有七名留学生参加了比赛并获得了大赛的优秀奖。通过平时锻炼，身体素质提高了，要求看病的少了，有力地保证了学习时间和学习效率。

1994年9月，在“西安古文化艺术节”的开幕式上，西安公路学院的留学生应邀参加跳绳表演以增加节日的喜庆气氛。当他们登上西安城墙。看到天空中五彩缤纷的焰火时，高兴得手舞足蹈，纷纷合影留念。有的留学生说：“中国真伟大！我要将这些照片寄回国去，告诉家里人这里的生活丰富多彩。”有的说：“我们现在在西安学习，西安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要为西安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这几次活动，学院的留学生跟省跳绳协会的胡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国庆”期间，应胡老师的邀请，学院组织留学生到他家作客，同学们都非常高兴，身着节日的盛装，大家畅所欲言，欢声笑语满堂，又一起吃了传统的节日饭——饺子。归来途中，同学们都说：“这样的活动太好了，能直接了解到中国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节日的风俗习惯。”当他们得知这只是中国人中一般的生活水平时，就说：“这都是中国的改革

通过这些活动，西安公路学院体会到，来华的留学生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热爱他们的第二故乡西安，热爱他们的母校西安公路学院，是与老师们平时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分不开的。许多留学生毕业回国后，积极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尤其是在与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在来信中或与中国援外人员的交往中谈到他们对中国的感情。对母校的向往，表示只要有机会，一定再来中国。

杭州大学的任课教师们

任课教师的地位和职业性质比较优越。一个留学生到中国留学，他接触的中国人很多，其中最经常接触的是他的任课教师。一年中，几乎有9个月的时间是在课堂上和授课老师一起度过。在留学生的心目中，教书是一种职业，它传播知识，不含政治因素，教师是受到尊重和信赖的朋友和长者，因而，他们有许多想法在一般场合下不愿意暴露，但却会和他们所信赖的老师坦诚交流，同时也愿意接受教师的建议。

杭州大学的教师们除在课堂上与留学生在一起外，平时在辅导、课外活动和与学生个别或集体接触也较多，有的教师还把留学生请到家里去作客，相处得像朋友一样。在这样轻松自如的气氛下，潜移默化地做一些思想工作是很有效率的。

近几年来，来华学习的留学生大都要求了解中国的现状，要求学习最新词语。杭州大学的外国留学生部对外汉语教研室也随之开设了“报刊选读”、“当代中国话题”、“新闻视听”等课程和中国文化系列讲座，并且编写了相应的教材。这些课程既有学习语言、交流文化的功能，又具有让留学生了解中国社会，理解中国国情，从而接受某些规章制度的约束和促进中外友好的作用。

例如，留学生对杭州大学晚11点关校门意见很大，曾向留学生部提了多次意见，有的甚至要求取消这一规定。虽然管理干部向他们作了解释工作，但仍有不少同学不理解，把意见提到学校外事处。任课老师知道这情况后，在上关于中国教育制度的口语课时，有意识地把校纪校规作为一堂课的主题来讨论。在谈到学生的行为规范，中国古代的师道尊严，以及现在的校纪校规时，也请留学生交流各自国家的学校规章情况。通过交谈讨论和老师的引导，学生们认识到各个国家教育制度不同，校纪校规也会有差异。通过比较，他们觉得杭州大学的校园管理规定还是有道理的，表示能够理解。不知不觉地，他们在课堂上便接受了学校制定的这个规定，于是，慢慢地，他们对晚上11点关校门也就习惯了。因此杭州大学感到应该主动抓住课堂教学这个阵地，让外国留学生了解中国。如“当代中国话题”课，针对学生感兴趣的问题，编写了有关“一国两制”、“经济改革”、“人口控制”、“医疗中药”等内容的教材。一方面让留学生学到最新的词语，另一方面让他们了解中国当前的政策和国情。这些教材都从让人了解情况的角度编写，有丰富的材料，鲜明的观点，也不回避存在的问题，给人的感觉是客观的，合情合理的。在教学过程中还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允许保留意见，决不强加于人。留学生对这样的教材和教法颇为欢迎，效果不错，还意外地纠正了一些留学生对某些问题的偏见。

例如，在上“一国两制”时，留学生提出：“香港问题在1997年解决了，台湾能行吗？”任课教师把大陆和台湾的关系解冻以来的种种变化，而且越来越令人欣慰的实际情况摆出来，与以前不相往来的局面相比较，留学生承认这些变化的事实。在讨论中，教师对“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天，相信发展下去，也会有明天。而且你们也一定会友好地祝愿台湾和大路统一的吧。

又如计划生育问题。有一位德国学生刚到中国时，认为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不人道的。后来学了“人口控制和独生子女”一课后，明白了中国人口多所带来的许多问题，明白了中国控制人口不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全球的利益。再加上这位教师对独生子女政策的阐述，那位德国学生意识到自己以前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不了解而产生了一些误解，认识到如果中国不进行计划生育，对中国和世界都没有好处，从而理解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学习关于老人问题时，在课堂上教师和留学生一起交谈了各自国家的老人生活，经过比较，一位加拿大学生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的老人生活不错，有意思，比外国的老人幸福。”

因此教师队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能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课堂教学等效果将会更好。

1990年春天，一位日本的留学生患了暴发性重症乙型肝炎，病危住院期间，杭州大学组织教师和干部轮流日夜在医院陪护和处理有关问题。尽管医院尽了最大努力抢救，该生终因病情恶化，治疗无效而死亡。由于老师们连续数日夜以继日地工作，死者父母非常感激，他们积极配合学校做好善后处理。回国时，其父母留下了充满激情的感谢信，信中写道：“志麻发病以来，一直得到老师、同学及宿舍师傅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辛勤周到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我女儿生前在中国跟许多好朋友一起学习、生活。我们相信，她在杭州度过的一年肯定充满愉快和幸福的回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深情厚意。”这件事，感动了在校的其他留学生。改变了少数留学生对中国、对留管干部的看法，对老师们更加尊重，师生关系更加融洽了。

1990年6月发生了一件事，杭大有部分留学生宿舍楼窗口悬挂黑衣服，当时学校采取冷处理方针，没有使事态发展，也没有影响到中国学生，维护了学校和社会的稳定，但事实本身已说明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偏激态度。学校通过各班班主任了解情况，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向他们说明他们的作法是不对的，后果是不好的，并阐明自己的观点，后来，不少学生在老师面前表示歉意，并表示以后不再“找你们麻烦了”。从那以后，留学生无论是提意见，还是自己举行什么活动，如舞会等都比以前客气、有节制了。在留学生部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在“四五六敏感时期”，留学生中未出现异常情况，维护了学校的稳定。

北京经济学院的汉语表演赛

1995年4月25日上午，北京经济学院对外文化交流部组织外国留学生举行了一次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汉语表演比赛。既有“花木兰”、“武松杀嫂”等传统文化节目，又有介绍“大锅饭”、“铁饭碗”、“走后门”及中国礼貌用语等以现代口语为主的小品；既有对不正之风的批评和揭露，又有抒发师生友情、留恋学校学习、生活的真情实感；还有“我的中国心”、“一封家书”等流行歌曲。每一个节目都灌注了师生的心血，每一个节目都充满了亲切、友好、热情、振奋的气氛。

第一个节目是二人小合唱，学生自己作词作曲的“祝经济学院好运”，有唱有跳，活泼风趣，一开场就在会场掀起了热烈的气氛。一直到最后一个节目诗歌大联唱，整齐的服装，悠扬的歌曲，清晰的汉语激起台下一片片掌声。虽然没有照明，没有专业舞台，没有乐队，但是广泛的参与却给每个留

演出结束后，师生们仍沉浸在兴奋和欢乐中，他们议论纷纷，有问有答：“花木兰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名列前茅’是什么意思？”“一班刚学习两个多月就能用汉语表演小话剧，真棒！”“七班的相声说得真好，是咱们今后学习的目标！”北京经济学院的八个班 100 多名学生，其中参加演出的有近 80 名，这是一次群众性普及性很强的汉语表演赛，它不仅检验了师生教与学的水平，还促进了学生们参与教学实践的热情和积极性，同时活跃了学生生活，密切了师生关系，激发了学生们强烈的求知欲和学习愿望。更使全体教师深受鼓舞的是，为了参加这次汉语表演赛，学生们在找材料、编节目、排练演出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热情；几十遍、上百遍地背诵歌词、台词，在练习和表演的同时，学生的学习态度变被动为主动，增添了学习的兴趣，促使他们更自觉地学习汉语。这比教师多上一节汉语课，多讲一节《中国概况》，多留一些课后作业更有吸引力，更见成效。

天津市高教局举办外国留学生运动会

在第四十三届世乒赛经过 14 天紧张、激烈的角逐刚刚降下帷幕时，“天津市第五届留学生运动会”便在乒乓球掀起的炽热氛围中于 5 月 28 日召开了。这届运动会只设乒乓球一个项目，主题突出、寓意深刻，它是在津外国留学生的一次运动会，也是一次友谊聚会。经过各校的选拔，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 16 名选手参加了本次男子乒乓球个人项目的角逐。

本次运动会由天津市高教局和天津市高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学会主办，天津大学协办，在天津大学举行。16 名运动员分别来自韩国、伊拉克、叙利亚、马来西亚、朝鲜、日本、土耳其和斯里兰卡 8 个国家，其中有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和汉语自费生。比赛采取了淘汰制。参赛队员非常认真，一板一板地打，一分一分地拼。韩国留学生高明载和朝鲜留学生陈永革第二盘比赛一直打到 26 : 24 才决出胜负。土耳其留学生穆达的扣球下手快，力量大，一招一势看上去颇有点功夫。一问才知，他是去年九月到中国后才开始练习打乒乓球的。他告诉同学们，到中国后几乎每天都练习打球，很高兴能参加这次活动。韩国留学生郑云洙和文采奎在第二轮比赛中相遇，双方各不相让，比分交替上升。围观的韩国留学生们以特有的热情为运动员加油鼓劲。一时间，赛场气氛异常热烈，颇有些“大赛”的味道。来自叙利亚的阿德南是天津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尽管他已超过 30 岁，但凭借实力打入了前 8 名。他说：“胜负不是主要的，参与和友谊才是目的。”最后，南开大学马来西亚留学生李忠志获得第 1 名，天津师范大学韩国留学生高明载获得第 2 名，天津大学朝鲜留学生金德成和韩国留学生郑云洙并列第 3 名。

天津市留学生运动会到此已连续举行了五届，旨在活跃各高校留学生的课余生活，加强留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各国留学生之间的友谊，受到了留学生的欢迎和好评。

广西医科大学对留学生的管理

留学生工作经常会遇到突发事件，作为一名合格的留管干部应该根据情况，深入学生，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做好学生管理工作，使留学生工作处于主动地位。

广西医科大学是这样做的。

一、注重教育，实事求是。去年 10 月 28 日，一名日本学生在外出骑车

双双来到留学生办公室要求解决此事时，校领导以冷静的头脑，妥善地处理了此事。

首先，学校通过分别向双方了解事发的地点、时间、经过及具体情况得知，两人在行驶时都未完全遵守交通规则，且出租汽车司机有酒后驾车之嫌。由于两人在赔偿数额问题上出入较大。学校出面解决未能达成一致。鉴于这种情况，学校建议留学生、司机及学校三方到事发所在地的交通管理大队以法律的手段解决此事。在交通管理大队，学校首先介绍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对学生进行了批评教育，使之明白外出应自觉遵守中国的交通法规。与此同时也介绍了当时正处于我国与日本之间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敏感时期，请司机注意这一形势特点，在交通民警的帮助下，使此事较圆满地得以解决。留学生赔偿了 300 元人民币，还同留管干部一起清理了出租车内的碎玻璃，使出租车司机也很受感动。这件事正是由于处理及时、方法得当，既教育了学生又避免了矛盾升级。

二、态度明确，坚决维护学校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在一个学期的开学之初，曾发生了一起留学生损坏宿舍楼公共设施的事件。1995 年 10 月 7 日，学校发现原本星期五还完好无损的四层通道和五层教室的大门被人各踢了一个大洞。发现此事后，教师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很快拿出了解决办法。在留学生楼的一层服务台及被损坏的门上公开贴出通知，以严肃的态度对各种不道德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并要求破坏者主动到留学生办公室承认错误，这一举动在师生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在公共舆论的指责下，一名日本学生在发出通知五个小时后主动到留学生办公室承认了错误，并诚恳地做了自我检查，提出愿意予以赔偿。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中，干部们主动地工作，坚决维护学校规章制度，并使留学生明白爱护学校的教学、生活设施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真正了解学生、付出爱心。来华学习医科的留学生时间一般长达 4~6 年，有的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能回家一次，对家庭、亲人的惦念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家人发生生老病死或其他意外事件，他们更是坐卧不安。性格开朗的人，能找知心朋友、老师谈谈，以便宣泄苦恼，达到化解憋在心里的郁闷。但毕竟有心胸不那么开阔的学生。

一位某国的本科生，到广西医大已四年了，由于家中的一些问题，他非常想家。他要求其驻华使馆提供一次机票，让他在假期中能回国探亲，以便处理家庭问题。当使馆表示不能提供机票让他回国探亲时，他非常失望，心灰意冷地走向房间，关上房门，一口气吞了 60 多片安眠药。幸好隔壁房的同学有事找他，看到他那昏死的样子，及时送他到医院急诊科抢救，才脱离了危险。还有另一位硕士研究生，他在留学前苏联期间，与同在那里留学的一位女同志结过婚。回国工作不久，他们离婚，还有两个孩子，后再婚，又生了一个孩子。他到中国留学一年多，他的家庭再次破裂。他的第二位妻子离家与人结婚，小孩子无人照顾，使他陷入无限的痛苦和思念之中。加上专业学习的压力，要看参考书，做大量的实验及需撰写一定分量的毕业论文才能获得硕士学位，心里更是不安，成日忧心忡忡、郁郁寡欢，继而失眠、多疑、性格变得怪僻，许多人不愿跟他接近，他也感到非常孤独，数次提出要退学回国。

这些情况正需要教师及留管干部们的细心观察，深入了解，并付出爱心来帮助这些留学生，打开他们的心锁，使他们变消极为积极，化悲痛为力量，敢于面对现实，敢于迎接挑战。

舍己救人名留美国

1997年9月15日上午10时，美国新泽西州殡仪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一个普通中国留学生的追悼会。他就是在异国土地上因抢救他人而牺牲的留美医学博士崔剑平。

崔剑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在突如其来的生与死的紧要关头，毅然把生留给了别人的人。

1997年9月2日，是美国新泽西医学院开学的第一天。学院研究生会组织了集体郊游活动，共有13人参加。其中6名中国留学生，7名美国学生。在此攻读神经科、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崔剑平也在其中。

中午时分，崔剑平一行人在河边公园处休息，吃过饭，有的下水游泳，有的在岸边休息聊天。来自中国的另一位留学生游荃旭下水向河中心游去，刚游到河中心，他突然发觉两腿发沉，游不动了，身子直往下坠。游荃旭心知不好，立刻大声呼叫：“救命！”崔剑平闻声站了起来，当他听到第二声“救命”时，顾不上脱衣服就一头扎入水中向游荃旭游去。两名美国同学一看事情不妙，也跟着跳入水中，另一名美国同学划起独木舟前来营救。崔剑平救人心切，潜入水中托着游荃旭就向独木舟游来。就在将托出水面扒住独木舟的时候，他头部被船重重地撞了一下，顿时失去知觉，沉入河底，没有呼救，没有挣扎，几位美国同学都在集中精力抢救游荃旭，谁也没有注意到沉入水底的崔剑平。

游荃旭得救了。半小时后，当一位路过的美国老人发现河面上漂着的两只人脚时，人们才发现崔剑平一直没有上来。他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年仅25岁。

这个普通留美博士之死，震动了美国新泽西州，甚至美国东部。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爱心也不分肤色。

崔剑平博士牺牲的消息迅速在新泽西州传开了。当地的许多华文报纸纷纷刊载消息评论，盛赞崔剑平的壮举，同时，也对他表示了深深的惋惜。9月4日，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电话通知了崔剑平的父亲所在的机械部济南锻压机械研究所。所领导非常慎重地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崔剑平的父亲。可是工程公司副经理、高级工程师崔之韬，这位59岁的父亲怎么也不相信自己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爱子离他而去。他一下子就病倒了。所里又让在济南机床二厂汇报工作的崔剑平的姐姐崔艳梅去济南三中找回正在给学生上课的母亲。“这不可能，绝不可能！剑平前几天还给家中来过电话。”剑平母亲听到这消息后，大声呼喊道，“我不信，我不信呀！”

1997年9月12日，崔剑平的父母、姐姐来到崔剑平生前在美国学习、生活过的地方。在殡仪馆，他们全家见到崔剑平遗体时，他表情安祥，就像睡着了一样。

崔剑平的导师查·安得森的父亲曾获得过诺贝尔奖。崔剑平将由查·安得森来指导博士毕业论文，崔剑平是她最满意的学生之一。在她得知剑平牺牲后，十分悲痛。她告诉崔剑平的父母：“在剑平来到这一年中，他的聪慧过人越来越显露出来。他工作勤奋，很快就掌握了多种复杂仪器，他将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是无疑的。”

崔剑平在97年4月份搬到一对中国夫妇家中居住，和他们相处十分融洽。他牺牲后，房东太太晚上睡不好觉，汽车一响就以为是剑平回来了，她的女儿更是对剑平感情笃深。她在日记中写道：“剑平叔叔没有死，是远去了，过一段时间还会回来的。”

他总准备好第二天的饭菜。他很少去餐厅、饭馆吃饭，因为那里很贵，在家做好饭，带到实验室热一下就行了。他自己买了车以后，都是自己修理自己换油，为的是省钱来买书学习。

10月17日，崔剑平的家属办理完崔剑平的后事，返回上海。下午，在剑平就读的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门前，学校组织了“纪念崔剑平校友植树仪式”。崔剑平生前的校友满怀对他的思念，将一棵象征万古长青的罗汉松栽在花园中。

在济南锻压研究所、济南机床二厂，人们纷纷为崔剑平家捐款，以安慰他年迈的父母。

崔剑平走了，他的英名留在了美利坚合众国，他的事迹在世界范围传播，这是中国人的自豪，是崔剑平家人的光荣。他是当代青年人的楷模。

我的女儿会幸福

这是一位年已花甲的中国父亲，在他的亲人中就有能向您提供异国生活信息的人。下面请您听他说——

女儿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几年前，她结交了一位名叫汤姆的美国男子。最近他们决定结婚了，邀请我们赴美参加婚礼。

当飞机到达洛杉矶机场时，我们很快就看到高举双手前来迎接的女儿，在她身边碧眼金发、高大壮实的白皮肤男青年一定就是汤姆了！一见面，我们就热情地拥抱起来，汤姆还用中文向我们问好。

女儿家的墙上挂着一幅中国的《百寿图》，卧室里也挂着中国山水画，迈进我们住的卧室，竟有一个镶嵌在黑丝绒上的毛主席像章，下面用一盏台灯反照着，像章被映衬得金光闪闪、庄严肃穆

汤姆非常热爱中国，曾去过台湾和香港学中文。他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会打太极拳，痴迷中国的诗词、书画，也特别崇拜毛泽东。汤姆念大学时了解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过程，他认为毛泽东能得到12亿中国人民的一致崇敬和爱戴，这种领袖才能太了不起了。他说：现在他在工作中就学习毛泽东，注意团结人。

女儿家的书架，上下几层高矮不一，下面的矮，放着小版本书；上面的高，放画册一类的大书。那放彩电和音响的本架，也是用两层本色本制板搭架而成。这些家具风格独特，都是汤姆自己动手制作的。

我好奇地问他，怎么学会做家具的？他回答说，他父亲是学土木工程的，连家里住的屋子都是自己设计，自己动手盖的，所以他从小就学会了自己动手做东西。

汤姆的父亲是个工程师，母亲是教师，夫妻十分恩爱。我们在美国时，恰逢他父母结婚45周年纪念。汤姆兄弟姐妹四人相约在纪念日当天，从美国各地回家去为他们祝贺，以便给他们一个惊喜。汤姆的妈妈为此激动得热泪盈眶。

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又让我们很吃惊。汤姆父母曾因租汽车借了他100美金。回去后，特意寄了来还给他。我们回国时女儿开了支票给我们，这使汤姆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他们这次已经化费了不少钱，怎么临行还要给我们钱？女儿告诉他说：“这是中国人的习惯，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有趣的是，我们回国后，女儿来信告诉我们说，汤姆让我们去银行立个帐号，他以后每月发工资时要“拨”50美金给我们，也尽他做女婿的孝心。多么可爱的洋女婿！

作为中国的父母，最担心的是怕美国人讲性解放，离婚率高，怕女儿的

美国人也是珍惜婚姻、追求家庭稳定的。汤姆的家庭就是一例。在他们庆祝父母结婚 45 周年时，他大哥的祝辞是：“谢谢父母给我们树立了夫妻和睦、相亲相爱的典范。使我们兄弟姐妹都有一个美好幸福的家庭。”

一次谈到女儿的一位女友，因丈夫另有新欢而被遗弃时，汤姆很气愤地说：“这说明他的丈夫是个对家庭没有责任心的男人。”

现在要去问这位父亲，他会说：“我和老伴对女儿的婚姻和异国生活充满了信心。”

在国外的数量留学生将是潜在的巨大资源。

英国《自然》周刊近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专门谈中国留学生问题。文章说，现在在美国的中国大陆学者和学生大约有 12 万人，其中大部分是 1980 年来到美国的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1995 年有 2751 人获得博士学位，占中国大陆留美学生总数的大约 10%。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有 1239 人获得博士学位。如此之多的有才华的人移居国外表明中国人才流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是人数很多而且事业有成的移居国外者也是潜在的巨大资源，因为中国在谋求扩大它自己的科学和技术基地。

文章说，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怀着完成学业后返回祖国的这种期望来到美国的。在美国的中国学人仍然有一种强烈的中国意识；自 90 年代初以来，他们同中国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美国，就业和资金变得紧张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正在进行改革。能取代即将退休的人的中年学者太少。所以，他们返回中国有可能在学术界迅速崛起。目前还不愿永久返回的许多人正在寻找其他途径参加交流合作

二

泰国华人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国——中国。

10 月 9 日，日本《读卖新闻》刊登了该报驻曼谷记者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泰国华人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国》。

文章说，在东南亚，泰国曾被认为是同化现象最为明显的国家，“华人意识”比较淡薄。但如今该国重新评价中国的气氛日见浓厚。在 6000 万泰国人口中占 10% 的中国血统的泰国人，开始把目光转向自己的祖先。例如，报纸上近来不断呼吁把汉语作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外国语”，重新认识华裔移民为泰国社会所贡献的力量等。

从 19 世纪末开始，泰国的中国移民逐渐增多。二战前后急剧增加。目前不少华裔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取得了泰国国籍。当代中国移民多为港湾工人，处于泰国下层社会。后向商业领域发展，在 60 年代以后的泰国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目前代表泰国的财阀中很多都是华人，其中近 70% 的财阀住在曼谷等城市地区，可以说泰国的城市文化是华人确立的。

近些年来，华裔泰国人在对华投资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首先在经济方面开始“回归祖国”。

鉴于这种动向，《民族报》最近刊登评论说：“要重视、重新认识中国移民在泰国所作的历史贡献。改写官方拟定的历史。”据这家报纸说，该评论引起了很大反响。

4 年前，在曼谷郊外设立的华人大学“华侨崇圣大学”，承担研究中国文化工作，目前正引起人们的注目。这所大学向所有泰国人开放，而且致力于普及中国文化。这所大学是东南亚唯一的一所独立的华人大学，因此引起了地区华人的关心，包括该大学的活动在内，泰国的动向对华人世界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十分引人注目。

三

日本《读卖新闻》近日刊登该报驻新加坡记者的一篇报道，题为《华语

背景是由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中国的抬头”。

在马来西亚，华人约占其总人口的 30%，教育部正在实行一项计划：到 2000 年以前，在包括马来人学校在内的所有小学（把中国的标准化普通话即普通话）作为一门正课。

华语被马来西亚列为第三语言，明年将在 320 所小学中开始华语教育。从 1998 年起在马来人中学里也设立 4 年制的华语课程。继马来百亚大学之后，马来西亚农业大学最近也设立了华语学科。

在印度尼西亚，已取消了对旅游中使用华语和汉字的限制。印尼一所大学校长说：“希望学习华语的学生很多。政府已批准开设华语补习班，今后将增加教育的场所。”

在新加坡，在政府的指导下，华语比过去更加受到重视。使用标准中国话的家庭所占比例，已超过了英语家庭，最近 10 年间（1980 年至 1990 年）由 7.9% 猛升到 23.5%。

该文说，有关国家的一系列动向表明，这些国家把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纳入了视野，对华语给予了全新评价。从一定意义上说，华语在东南亚的命运不仅是涉及语言和文化问题，而且是衡量各国的民族和睦以及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距离的指标。

四

中国人的乐观情绪和谋求发展的意志给人印象深刻。

美国《行政人员情报评论》近日刊登德国席勒研究所创始人的一篇文章，题为《25 年之后重访中国观感》。

这位德国专家 1971 年来过中国，当时他是一名年轻记者。这次来参加“新的欧亚大路桥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他在文章中写道，25 年后重返北京，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在时间机器里旅行的人，北京已经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当然，我一直听到和看到许多关于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情况的报道，可是当我作了一番今昔对比之后，才找到了这些报道中没有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过去 25 年里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变化不仅发生在这个国家大片大片的地区，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心理上也是如此。单是中国方面在研讨会上表达的极大的乐观情绪和谋求发展的意志，就给人以很深的印象。重访中国，是我一生中最有收获的经历之一。

五

爱花钱的中国年轻人对储蓄率是一种威胁。

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7 月 12 日刊登驻北京记者一篇文章，题为《爱花钱的中国年轻人对储蓄率是一种威胁》。文章写道，一些社会学家和消费品生产公司主管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拒绝继承中国人勤俭节约的传统，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这种趋势对中国超过 40% 的储蓄率的长期影响会很严重。当然，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这么大手大脚。银行的个人储蓄在继续增长。连 40 岁以下的爱花钱的年轻人一旦有了孩子，也会存钱的。但随着经济改革使人们更加富裕并带来西方生活方式，更多的年轻人正在养成像他们西方同龄人一样的挥霍习惯。

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向挥霍型消费方向发展的趋势感到担心。香港一证券公司负责人警告说，如果中国经济开始放慢，个人、商家和政府开支过大，可能导致像去年初震撼墨西哥那样的经济危机。

六

日本《每日新闻》7月24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题为《现在成为话题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

该文说，现在，北京出售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成为国际性话题。因为，不怎么对外吐露心里话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正面批评了美国和日本。在中国，掀起了禁止餐厅和商店起洋名的活动。这一活动始于去年夏天，有人称之为反殖民地文化活动。《光明日报》今年6月重提此事，使之波及到全国。高呼“应该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到自豪”的文化人引人注目。出现了呼吁用国产产品，批评崇拜外国产品的动向。

文章说，美国使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落空和阻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本来就对美国不满，台湾问题成了反美情绪激化的契机。日本因中国进行核试验冻结了一部分无偿援助。然而，中国方面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援助是与战争赔偿相抵消，冻结援助刺激了反日情绪。

一、旅游学习乐悠悠

不久前，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作者在北京烤鸭店邂逅阿兰·卢耶，阿兰是法国巴黎大区某公立中学的教师，当时他正与40多名15—16岁金发碧眼的姑娘小伙们吃得正香呢！

法国很重视教育，中学教育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政府及社会都非常关注。阿兰十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就对中国古老的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相信，中国一定对法国青少年有无尽的吸引力。于是他学习了汉语，与中国几所中学建立了友好关系。现在，他每年寒暑假都作为领队，带领几十甚至上百个中学生来中国，一边学习，边游览，让学生愉快地既学本领，又学做人。

法国学生来到中国，不安排住宾馆，而是住一所友好学校的学生宿舍；不在饭店吃饭，而在学校食堂就餐，以便有更多的机会与中国学生接触，体验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早晨，学生们起床后，可以到街上的小店领略小吃、油饼、豆浆的口味。上午主要是学生们学习汉语的时间。学习的课程有阅读、书写、口语、书法和写作。法国学生对中国书法怀着一种非常崇拜的心情，手拿毛笔，在宣纸上写字，对于法国学生来说既神秘又高雅。学习之余，男孩子们最心驰神往的是中国的“功夫”，而爱好艺术的学生则拿着腔调学唱几首中国的民间小调，京剧也同样吸引着他们。

下午一般组织外出参观游览。故宫、长城、天安门、王府井都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不少人愿意自己租一辆或买一辆自行车，像中国人一样穿大街走小巷，去发现心目中所向往的异国情调。也有人在街头巷尾遇见热情的居民用新学来的汉语打个招呼“你好！吃了吗？”由此交个中国朋友。

晚上的活动可以称作美食课和艺术课了：烤鸭、涮羊肉、饺子，火锅都是不能不品尝的佳肴。京剧、杂技、民族舞、音乐也是不可不识的中国传统艺术。

在这样丰富多彩的假期中，学生们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本领，了解了异国风情，广交了朋友，经济实惠又锻炼了生活自理能力，阿兰·卢耶自然成为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二、世界青少年志趣趋同

日上三竿时，只要这一天是上学的日子，全世界家庭比较富裕的青少年，几乎都是以相同的方式开始他们一天新的生活。美国的青少年穿上他们蓝色的牛仔裤和棉恤衫；在匈牙利，青少年们一边背起他们的书包，一边匆匆忙忙地迈过大门。

一项调查了2.5万各中产阶级家庭的报告显示，全世界青少年的共同点不只在于迷恋穿名牌牛仔裤和耐克运动鞋。据作这次调查的人士说，全世界五大洲15至18岁的青少年，在信仰、价值观、理想上也日趋相同。

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家庭和谐欢乐、事业有成、梦想成真。全球的青少年都重视家庭生活，这似乎与目前社会上流行的观点完全不同，在受调查的10人中有8人表示，家庭是他们生活“指导原则”的重要来源，甚至包括不重视家庭生活的美国。但在青少年中，每2个人中就有1人说，家庭生活在所有生活关系中居首位，比“友情”、“找乐趣”、“改造世界”都重要。所以，全世界的青少年都很关心他们父母的健康，在他们担心的事情中，对

全球的青少年也十分重视自己将来的事业成就。在 10 名被调查中有 8 人认为，“竭尽所能取得个人成就”是件重要的事情。这份报告认为，在认为自己一定能出人头地的人中，以中国青少年对自己最具有信心；在这方面，日本青少年的自我成就信心最低，这可能是因为日本人注重团队精神的缘故；美国青少年的自我成就信心居于中间。

15 至 18 岁年龄段的青少年正处于所谓的叛逆阶段，在拒绝成为文化窠臼方面，也是同声共气。他们反对一切老套套，喜欢自我主张。目前，中产阶级家庭青少年文化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青少年文化都将转变成某一种文化，而只是成为一个混合体，将有更多的相互关联而已。

北美大陆，最原始的土著民族印第安人书写“一、二、三”和我们的中文是一模一样的。有一种说法，印第安人是从亚洲东北部去美洲的。如果这种说法能成立，那他们就和炎黄子孙有血缘关系了。

一、沉重话题的提起

古代的中国人把自己生活的地方看作是世界的中心，“中央之国——中国”由此得名。后来有了张骞出使西域，有了玄奘游历列国，有了郑和下西洋，中国人当中的优秀分子看到了世界之大，天外有天。华人漂洋过海，异地谋生，滥觞于秦汉，蓬勃于近代。尽管中国皇朝刑律规定：私自出洋者，斩；这条刑律一直执行到1894年，为避战乱求生存，乘舟楫远行的人还是层出不穷，直至遍布五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以致有一句话流传甚广——“有阳光，有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唐朝盛时，声誉远播海外，于是世界各国因称中国人为“唐人”，“唐人街”在诸多城市占有一席之地。《明史·外国真腊传》即称：“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

早在150多年前，黄皮肤、黑眸子的中国人就冲上了北美这块充满希望又布满荆棘的新大陆。西部淘金、修建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洒下了华人的鲜血、汗水。而美国在1882年至1943年半个多世纪间实施排华法案，旧金山附近天使岛等处的牢狱又留下了华人移民的一页斑斑血泪史。1872年8月11日，容闳带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官费留学生3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开中华学人留美之先河。据说当时动员这30名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颇费了些口舌，跟今天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排起长蛇阵等候签证的热忱绝对不能同日而语。谁知道美国是个啥地方，那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也根本不认识中国，甚至不知道中国人的模样，靠着去过中国的传教士带回的画像糊里糊涂地揣摩。1910年赴美的胡适、赵元任，20年代的冰心、梁实秋，30年代的贝聿铭、吴健雄，40年代的李政道、杨振宁、钱学森，中国几代杰出的知识精英都从这片敞开的丰厚的土地上汲取了养份。同时，华人及几乎全世界各地来的移民又不断为这块大陆注入青春的活力、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利坚赫然崛起，以它的先进科技、雄厚经济实力一醒世人耳目。“到美国去”，成为世界潮流，经久不衰。尼克松先生在早春的料峭中来到紫禁城，与毛泽东主席握手言和，中美之间隔绝数十年的坚冰霍然打破。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978年6月提出增大向外派遣留学人员数量的重大决策，揭开了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出国留学的序幕。当年12月26日，第一批公费留学生50人奔赴美国，在老美眼里像大熊猫一样稀罕，常常受到免费招待的礼遇。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来美移民呈几何状猛增。打开了大门，人们终于发现海外也存在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而美国自然而然成为趋之若鹜的首选之地。这固然是它确实有实实在在的份量，足以吸引人投身其间，再者也出于一些无行文人臆造的天方夜谭般挡不住的诱惑。“美国情结”不由分说地取代了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苏联情结”。我国是世界上利用国家财政拨款派遣公民出国留学经费数额较高的国家之一。虽然许多省份，众人还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国家还是咬牙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留学生、访问学者。截至1995年底，国家、单位公派及自费留学者共近25万人。其中人数最为集中的是美国，先后有9万人通过不同渠道自大陆赴美留学，目前大约有7万人获得了“绿卡”，成为美国移民史上素质最高的新移民。滚烫的“出国热”曾长时间席卷中华大地，“冲出国门”，撩拨着千千万万颗心，牵动着千千万万个家庭。近10余年，公民

分的人们理直气壮地要当世界公民，要到海外去闯荡立足。

世界这么大，有一部分人能够走出去，无疑是正常的。对国家来讲，获益之丰自不待言。尽管一时的人才外流造成了不少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人才断档，青黄不接。但从长远看，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教学、科研、管理以及其他方面的高级人才，缩短了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扩大了与国外在各个领域的交往和合作。《中国科学家辞典》中收录的科学家，几乎95%都曾在海外留过学。从事社会科学的学者同样需要学贯中西，方能出大家。林语堂先生有一副“夫子自道”的名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本人就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旅居美国。从个人角度看，也是该去。人最重要的是经历。在一生中，能够外出羁泊一段，其生活的密度和质量将大得多。因为他由此一下子跳出了原来的逻辑状态，尝试着求异思维，多向思维，让眼睛习惯于杂色，让耳朵习惯于异音，换个角度看世界，人才能变得成熟。在这个经济愈益的一体化、生活愈益全球化的世界，体现时势所趋，去把握成功的机会。于此演绎出的一幕幕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命运情感的波澜起伏，全是千金难买的财富。至于那些在最原始的动机驱动下，一门心思要去淘金，要改变自己生活状态的人们，也无可厚非，乃人之常情，哪怕他去了后又后悔了，把对天国天堂的幻想一下子转为对地狱的诅咒。一位留学生这样写过：“如果不出来，‘出国’这个念头会永远缠住我，使我无心做任何事。”鲁迅先生有言：“心死的应该出洋，留学是到外国去治心的方法。”（《伪自由书·内外》）此话的深意只有出过洋且“心死”过的人才能心领神会。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有那么多年轻或不同年龄的中国人背井离乡，负笈西航，涉过浩瀚的太平洋，来到一个陌生的彼岸世界，其悲壮的程度不亚于本世纪初广东、福建人的下南洋闯美洲。其中涉及到的生活幅度之广，可测量的人性深度之深，可谓一幅壮阔的人生画卷。其中，希望与痛苦共存，正面与负面交织，成功与失败融汇。

故土难离的中国人浪迹天涯，几乎每一个都有着不凡的故事。踏上新大陆，人们才明白来得晚了一点儿，美利坚这一方沃土已经是那些白的、黑的和不黑不白的帝国公民的天下。各种各样的学业、行业都已然高度发展、精耕细作，难得有你施展的份儿。胡适，冰心等老前辈不用为柴米发愁、一心只读书的当年像海市蜃楼般的遥远，80年代的留学生大多是自费留学生，不少公派官费生也常感到经济拮据，寅吃卯粮，更不用说那些专靠打工的谋生者和身份不明的偷渡客了。于是，初到美国、语言不好的人们最常干的就是到餐馆去刷碗、送外卖、到别人家去当保姆或清洁工，给银行、公司当保镖、警卫、到衣厂头也不抬地车衣一类的粗活儿。国内原有的名声、地位在这里统统化为乌有，别管你是什么处级干部、副教授、主任记者还是厂长、经理，都得从最底层干起，靠出卖劳动力糊口。各界骄子倏忽间发现连养活自己都成了问题，对活了半辈子的人，那番惶恐岂可了得！在犯罪率高、歹徒出没的地区，为争一口饭吃，面临的更是名副其实的生死斗争。依我看，好与不好，都是感觉，而感觉来源于比较，有比较才能鉴别。跟谁比？当然主要是跟自己比，以国内的地位为坐标。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人们对自我的存在变得非常有意识。国内唤风唤雨或家世显赫的人物，今天要靠一双手，靠体力、靠隐藏、泯灭自尊和傲气，在被人呼来呼去的气氛中挣钱，他的心理怎能平衡得了？在生存的重压下，多少人成了打工机器，只知上班、吃饭、睡觉，大脑渐渐麻木了，对艰辛困苦不再有知觉。处于脑力和体力的双重疲惫，刚踏上异域时的慷慨壮志、满腔抱负在一寸寸的消逝，最终豪情不再，心灰意冷。这种境遇，使人残酷地骤然意识到自己的真实价值，终于发现自己力

日子，一分一毫地攒钱，成了最径直的追求。生活失去了它应有的色彩。

过去的世界是半凝固的，似乎从降生人世命运就是安排好了的，只要一步步去走就是了。人们在享受从一定的单位、组织保护下的安全感的同时，又渴望着冲破羁绊获得个性自由。美国人将个人自由看得高于一切。在这里，你是自由的，没有人管你想做什么（只要不违法），没有评说你的生存方式及能否生存下去。然而，自由是有重量的，搞不好，自由甚至是一种负担。一位访问学者曾感叹：“美国是自由的，没人管你了，但也没人关心你了。”这是一种真实的感觉。两种体制两种活法。习惯于“集体主义”依附关系的人，突然把他抛到一个人自为战、家自为战的环境，让他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离开他原有社会角色的位置，许多人会无所措手足，不知如何生活。硬着头皮去改变生活，势必要承受难耐的失落、心理平衡。不再有人会无偿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个人自由主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孤独的阴影和无援的无奈。最意想不到的是，从泱泱亿万人大国中出来的人，破天荒地感到了“人气”的不足、匮乏，不再有热气腾腾，众志成城的感觉，代之而起的是在国内很难体验到的抑郁感。通常，人与人的交往中，第一位的是排斥，第二是亲近，第三才是融合。且不说异国他乡别人对你的歧视、排斥，本人一旦种下了某种文化基因，置身在迥然相异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的撞击、冲突，对文化人而言更甚于经济压力，常常使他们的心理严重倾斜。没经过最初一段“文化休克期”的人，是无法体验“失落”、“没有归宿感”、“异己”等百般况味的。有的人郁悒成疾，难以自制，甚至走了绝路。

尽管有太多的不认同、不适应，使人无法释然，但是，人毕竟有着巨大的适应力，特别是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的中国人。美国就像座大熔炉，带着各自的时代烙印、生活经历和人生抱负的中国人轮流在里面冶炼着。改革开放的十几年，在这山望着那山高、这边看着那边好的犹疑中徘徊，数百万农民离开了土地，扑向城市，但又难以融入市场，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的群体，构成我国目前社会结构的第三单元。“我流向哪里？”——农民工问自己，闯京城的艺术流浪汉们问，海外的华人也问。同样沉重的话题，几分相似的心态。去？还是留？虽不像丹麦王子的“生，还是死”那般惊心动魄，毕竟也是人生的重大抉择。脚下是众望所归的美国，全球最具影响力、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基于种种动机，在美华人中的八成左右选择了留，留下，从此成了华侨、美籍华人。人的身份、国籍可以改变，但人的皮肤、血缘却无法更改，所以他们的故事还远远没有完结。

二、为什么留与怎样留

人生是一条有去无回的单行线，它的舛错与祥瑞都不是可逆的。某种意义上讲，生命也是一场赌博。

有的人是在拼死觅活办出国护照、签证之际就打定主意不回来了；有的人是到了那里很有认同感方四处打探怎样才能留下来；有的则是随大流，按着惯性走，从众心理使也——既然周围大多数蜂拥而来，我为什么要放弃？不能不承认，在美生活的人们，确有一种舆论的制约力，倘要舍此就彼，反其道而行之，还真得有点“反潮流”的勇气不可。

笔者曾就“为什么要留在美国”这个问题征询过一些人的态度。“不就图个日子好过吗？”被问者答。这是大实话，特别是经历过磨难的一批人，心已疲惫，只想在海外找个安居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别的事情就不去多想了。“美国的大环境好，干净，适宜于我。”——一位酷爱整洁近于洁

到，在很多人眼里，美国最让人心仪的是它的蓝天、绿树、碧水、白云，绵延万里到无边的高速公路。物质生活的富裕和生活设施的完善，社会的文明程度、服务质量，是目前国内无法相比的，是一般人不能不为之动心的。“刚开始来时，抱定学成要回国的决心，后来发现这里可以适应，可以生活下去，这个社会有一定之规。”来学法律当了律师的人这样解释他留下的动机。200年的法治国家，在美一言一行都动辄有法，初看似繁杂，茫无头绪，然而一旦深入其中，反会求得一种安全感，一种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保护。这对一个萍漂不定的外来人也许尤为重要。

为了生活——对凡夫俗子，芸芸众生来说，是天经地义的。

年轻人，尤其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他们对异域的适应简直是易如反掌，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哇里哇啦地跟美国孩子吵架了。他们早在国内已钟情于麦当劳的口味，接受美国生活方式不算什么事。近10年，一大批更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弱冠年华，“文革”、“上山下乡”在他们那里只是一个悲壮而遥远的历史故事。他们是家庭和学校的宠儿，从重点中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了重点大学。在大学里，他们理所当然地准备“托福”、收听“美国之音”，不仅熟谙美式“民主”和“人权”，而且叫得出美国摇滚歌手的最新排名榜和职业篮球NBA东西部全明星赛的新科状元。他们似乎生来就是要去美国留学的一代。涉过重洋，莘莘学子们只是渴望闯荡人生，享受光怪陆离的美国生活，肩上既没有什么报效祖国的重负，心里也没有什么营建小家庭的盘算，无疑，他们是最潇洒的一代。流利的美式英语，名牌大学的资历，他们来此求学、就业，道路极为宽阔、明亮。将来能否在这帮“神童”里面再出几个杨振宁、钱学森，也未可知。

国门洞开初始，最先得外出留学风气之先的是中年人，一群被称作“老大学生”和“老三届”的人。人们习惯用“沉重”来形容这一代人。在青春岁月，他们被迫失学，作为知识青年，在北大荒的亘古荒野，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在西双版纳的橡胶林里挥洒汗水，接受“再教育”，煎熬在“土插队”的炼狱。人到中年，门户开放，他们中的幸运者又开赴另一个炼狱经受磨炼，其义无反顾的势头颇似当年下乡和返城的潮起潮落，有人将其戏称为“洋插队”和“世界大串联”。赤手空拳，没有祖宗荫庇，没有亲友支援，语言不通，观念相悖，早已不该漂泊异乡的中年人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苦和厄运。本该是功成名就的年龄，再花许多时间、精力、金钱去啃英语，或许是一种生命的浪费。为了最起码的生存和温饱，在纽约的餐馆和衣厂，在旧金山的仓库码头，在洛杉矶的超级市场，在芝加哥的小杂货铺，都留下了他们艰辛打工的身影，留下了他们中年创业的痕迹。“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尚可忍受，因为他们有过战天斗地炼红心的根底，更难耐的是一种在理想主义难以继的痛苦中自省的心态。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教导中长成的这一代人，富于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它是这代人的优长，而换个角度看，也是这代人命定的悲剧。祖国的命运总是坚定不移地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心上。不管走到哪里都是放不下，每每“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然而，美国发达的科学技术、优裕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水准又着实吸引人，难以轻易放弃，叫人不甘心回去。一位在内蒙古插过队的旅美博士生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景况：“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理想主义教育下长大的，为自己的国家、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价值观。在美国提倡的是个人主义，似乎不必对社会承担什么义务，因此可以在这里生活得很轻松，但对我们这一代很多人来说，这样生活下去心理负担会很重，内心不会平静。”于是，“我们的心情和生活总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况。”他们生命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已经永远地留在了故土。说他们“人在异帮心系祖国”，并不是虚妄之辞。

何待言。在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失去了年龄优势的人要想立足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对每一个来访者都恨不得先认定你是有移民倾向的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官，却对要求赴美的中国老人们破例露出了宽厚的目光，一般一次申请就放行，不说二话。他们知道，老年人在美国通常不会久留，更不会对就业市场造成威胁。稍微上了点岁数的人到那里求职，哪儿都不要，四处碰壁，别管你原先如何战果累累。老年人多是去探亲或帮助照看第三代孙子、孙女的，他们确实呆不长。脱离了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一下子硬把他连根拔了，移到美国来，两个世界，时空瞬变，他就像做梦般晕眩。什么也听不懂，什么也瞧不明白，没有了厮熟的邻居、朋友，没有了沿街的叫喝、叫卖声，不会开车，连出门遛弯儿都成了天大的奢望。儿女们为生存奔波难得陪上片刻，他们整天关在屋子里跟咿呀咿呀学语的稚儿做伴，电视机无非是个摆设，只能自己自言自语，他们一点儿不夸张地自嘲是“蹲洋监狱”。为了安稳住老人，有的子女给家里的电视机装上“小耳朵”，可以接收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看到几万里外的“国家大事”。有的则一趟一趟去给父母借盘录像带，让他们看着解闷儿。美国的风景、空气再好，看多了也腻了，他们还是怀念故乡紧凑的屋宇和嘈杂的集市。连越来越逗人的宝贝孙子都不能拴住他们的心，一旦能走，多数人拔腿即走，归心似箭。他们只是属于那一片土地。也有一些老人喜欢这里的环境幽雅，气候宜人，将他乡作为自己的颐养天年之地。更有的雄心不死，开始另一番人生拼搏，自强不息，让暮年在异国再放异彩。然而，能这样做的微乎其微。

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时代，女性出洋无异于神话。早期来美的华人，多是从广东省前来拓荒的男性劳工，因排华政策，不许带家眷，女性来美的少之又少。数不胜数的华人男性只能过着单身生活，此情况到1930年以后才开始扭转，至70、80年代，华人男女人口基本上趋于平稳。这些年由大陆赴美的知识层次较高的人中，男性占了绝对多数，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假如按照传统的女性思维，女性在美国的生存比较容易解决，不管是嫁中国人还是老外，都不乏机会，中国姑娘的温柔、能干、美丽，有口皆碑。反之，中国小伙子想要找个碧眼金发的美国姑娘为妻，又谈何容易。这样，一些女性回到旧有的驿站，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忙忙碌碌，甭管读过多少书，拿过什么学位。美国的女权远不及中国高，高学历的女性当寓妇被视为正常。而这些闺英闺秀毕竟沐浴着“男女平等”的阳光长大，在享受着温馨家庭生活的同时，又往往按捺不住内心的失落，向往着干事情那种男性思维支配的冲动。确有不少职业女性在各自的领域里崭露头角，其才华、风度叫她们的男同行瞠目叹服。

当这些远行者在去留问题上颠三倒四、反复思量、踟蹰、彷徨、举棋不定之际，孩子常常成为重要的砝码。为了子女，是最冠冕堂皇、最理直气壮且最能说服自己和别人的理由。中国的父母亲为子女所付出的爱、遭受的苦累、做出的牺牲是世上少见的。国内如此，到了国外仍本性难移，甚至变本加厉。为孩子到头号经济强国谋求一个好的前途，是多少人在异乡艰苦卓绝的强大精神支柱。为此，年过半百的北京某大医院的主治医生可以到病房去铺病床，为此，国内大报的主任记者可以四五年一字不发表，站柜台出租录像带。问起他们的感受，都挺心满意足：孩子到底出来上了学。使人在感动之余又不禁想问，他们自身不是也拥有与子女同等质量同等宝贵的生命吗？就可以这样轻忽不顾？有识之人指出：中国至今之所以不发达，其中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进化不充分，每一代人不重视自身的发展，而对生育繁殖倾注过多的期望，其结果就形成了多层次、低质量的恶性循环。也有人不忍。某女士，国内首屈一指的大集团的部门经理，来美国时正赶上经济萧条，连招

汽车去一家餐馆打工，受尽了老板的轻蔑和奚落。起初，她也想忍，咬牙留下来为女儿留学铺一条路，可生存的窘迫实在度日如年。她打电话给女儿，女儿在电话里坚定地说：“妈妈，你感觉不好就回来。要是为了我忍下去，太不值。我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出去。”听完女儿的话，该女士毅然飞回故土。为人父母者含辛茹苦全心全意为了留在国内的子女，那些被称为“留守儿童”的孩子还往往不领情。他们也领不了情，缺少父爱和母爱、缺乏感情抚慰的早期经历，将会在孩子的内心深处留下隐患，造成他们性格上的严重缺陷。与父母之间感情淡薄是必然的，有的孩子从国内出来见到久别的父母，长时间甚至几年都不肯开口叫一声。一位年轻父亲回乡与自己6岁的儿子团聚，儿子竟一脸的冷漠，一口的大人话，他痛心地说：“为了孩子我也得回去。再说美国的基础教育比不上国内。”《北京人在纽约》电视连续剧中宁宁对其父母近于歹毒的仇视，在情在理，当不是凭空臆造。

美国是个务实的世界，靠生活本身能把你身上的幻想、诗意彻底剥去，我之以一是一二是二不折不扣的实际。结果，留学生变成学留学生，追求变成简单的留下，留下来就是最终目标，留下来就是一切，哪怕要饭也行——俨然是美多数人的信条，当然他们知道留下来决不会去要饭。赴欧洲留学的学人90%以上都学成返国了，并非人们不留恋那里的浪漫气氛、高雅情调，委实是欧罗巴排外情绪强烈，视移民为洪水猛兽，留不下。在美国，要留下就要解决身份，最终办下俗称“绿卡”的永久居留权。说是“绿卡”，其实是粉颜色的一张证卡，别看它不大，却关系到多少人身家性命和前途，成了多少人昼思夜想，千方百计要拿到手的唯一希望。绿卡，是每一个到美国求生的外国人的实际需求，同时还原他们以做人的尊严和内心的平衡。

在某些人眼里，更是一笔无形资产，一种显示自身价值的标志，一道安全护身符，一块自身以为更高的血统转换的跳板。在争取绿卡的道路上，有的人可谓轻而易举，国内的一场变故引起美国当局颁布一纸赦令，顷刻间近8万在美华人身份搞定，皆大欢喜。而正常时期，却有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为了这一张纸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不择手段，不惜以人格作交换，甚至铤而走险。在华人社区，非法弄到绿卡一向是个古老而利润报丰的行业，专擅移民档的律师手段之高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为了一张绿卡，演出了几多大悲大喜的活剧，至今仍有数不清的人在进行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复又滚下再推再滚的无望的奋争，一年又一年，消耗着大好年华。只图也能像其他人一样自豪地说一句“办下来了”，如同阿Q先生当年同样大言不惭地称——“革过了”。办下绿卡可以自由出入境了，同时又带来若干具体困难，每年必须在美国境内住够一定的时日。一位女士取得绿卡后回国忙于商务，两年都没能进入美国一趟，美国移民局来信警告，她置若罔闻，后来真被吊销了，她反而坦然了：“要什么绿卡，活受罪！”对全世界炙手日热的美国绿卡敢于如此傲慢的，太少见了。

怎么才能留下，才能取得绿卡？一句脍炙人口的台词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儿。”一时间，十八般武艺献演，异彩纷呈，无奇不有。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没完没了地念书。

很多人是以学生的身份出去的。公派的嫌钱少，每月区区几百元无异于杯水车薪，于是就想方设法找机会打工干活儿挣钱回家。意欲留下的人也多是心猿意马，功夫在念书之外。书越念越穷，特别是文科，有的人还需靠打餐馆工的妻子养活。好容易熬到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开始写博士论文了，资助也就没了，得另寻生路。既要为稻粱谋，什么都得干，又不能置课题项目于不顾，还得孜孜兀兀埋头苦读，其中滋味，一吟双泪流。虽说论文的写

受那份罪了，尤其是在洛杉矶等诱惑多的地方。美国社会，谁有钱谁就是本事，钱才是正经事，钱是祖宗，学位理所当然退居其次。再说，有博士头衔可能找工作更难。在那里，求职就是求生，其争抢的激烈程度是国内的同行难以想象的。很多时候，毕业即失业，且有失去身份被移民局官员纠办之虞。为了争取学校的资助，为保持身份，许多五十几岁的人还留在校园里读书，修了几个学位，他的子女或许同时也进入了中学的校门了。书，自然是念不完的，全世界数千年的知识，一个人毕其终生也只能学进多少万分之一，而这就是生命过程的全部吗？在留学生中，博士位被戏称为“博士候”，意为要耐心地等，耐心地候，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份工作，维持生存。否则就候在那里无尽头地傻等，任马齿徒增，两鬓飘霜。

——职业上降格以求。

一名博士后曾讲述过他所在学校两位博士后导师的际遇。一位已跻身世界级海洋动物学家的行列，另一位是免疫学专家，他的一项发现具有获诺贝尔医学奖的价值。然而，近年他们没有再发展新领域，如今星移斗转，他们的项目都未能获得政府的经济支持。在疾速度变化的美国社会，不论什么人都只能各领风骚二三年。优胜劣汰，社会竞争之残酷可见一斑。美国土生土长的著名科学家尚且如此，其他人特别是外来移民谋生之艰难可想而知。确有一批年富力强的留学人员在美国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站住脚，以他们的超众才华和潜质初露锋芒。但他们远不是全部。有统计显示，大约在学理工科的留学生中只是有不足10%的人能获得稳定的工作与收入，年薪在6万美元左右。学文科的除了极少数有幸能留校任教，看不到什么乐观的出路，能找个文秘之类的工作已是上上大吉，满腹经纶者去给人家当保姆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生计大事把社会科学的尖子们逼得改弦易辙，为数不少的转学计算机去了。美国的失业率，各州从6%到9%不等，总数得有近1000万人。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那些原先能扶竹竿不扶井绳的主儿也不得不放下架子，降格以求。一位博士生满怀信心地申请了若干个需具备博士学位的职务，每个职务约有60—250人在同时申请，最终仍不能进入最后两三个人的入围圈。为了生存，有的博士生毕业后毅然“下海”，去跳蚤市场摆个小摊养家糊口。有一位博士当上了餐馆老板，看到只要肯做就能赚钱，他情愿丢掉学业，一心一意练起餐馆来。在美国，钱比专业重要。没有钱，你什么民主和自由也享受不到的。

国内的教授到了这儿去教低能儿，主治医生去做护士的帮手，钢琴演员纤细的双手泡在油腻腻的洗碗池里，早已屡见不鲜。一批旅美的青年音乐家，其禀赋在美国也是难得的，但都不曾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挥，有的要靠打工才能维持学业。他们乐团应试，即使成绩比白人强，也没有希望录取。成群的中国画家排排坐在大街上为游客画肖像（其中不乏在国内风光一时的名家），已成为纽约曼哈顿街头长年保留的一景。尽管警察动辄拳打脚踢，全无人权可言，尽管被抓，被羞辱，来自上海的中年画家林林竟至横死街头，还是有一拨又一拨的艺术家冲上了曼哈顿，而且“连舔伤口的时间都没有”，强迫自己的心灵变得麻木起来。他们用扎实的基本功写实功力，同时用血汗和尊严去换取金钱，有的边画像边在课堂里研修，有的画到最后索性把街头画像变成了一种专业。哲学家张申府说过一段很有哲理的话：“人固不可轻生，也不宜把生看得太重。人如不把生活看得太重，什么事不可为？”依此说来，把过去世俗认为不怎么样的营生当作人生旅途中的一段过渡，也未尝不可。

三、留下、也不尽是好风景

留下了，“革过了”，然而并非一劳永逸了。留下也有留下的难处、失意及至尴尬。

美国居，太不易。学业的艰辛，就业的坎坷，住房的烦恼，子女教育的愁苦，绿卡的拖累，非法移民滞留生活情状之凄惨……过去、今天、明天都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在困扰着他们。诚然，近年旅美的华人中有丁绍光那样的大画家，住在宫殿般的洛杉矶比芙利明星山庄，有张海朋那样的实业家，在大洋彼岸圆了他的创业梦，但他们毕竟是凤毛麟角，是宝塔尖。还是让我们看看宝塔基座的状态吧。

某先生，原是国内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经理，来美两年，感慨良多：“在美国，如果没有专业优势和外语优势，发展起来太难了。尽管环境幽静，生活舒适，但精神压力很大，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操心，稍不注意便触犯法律，还不知道怎么犯的。当我千辛万苦挣到第一笔像样的钱时，百感交集，差点儿掉下泪来。这里的精神生活远不及国内，只华人圈子几个朋友交往，电视里的节目都是他人的事，我不感兴趣，笑不起来，有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我在北京时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人民大会堂也不知进去过多少次，我不能忍受在他国当二等公民的滋味。来这儿不久，我就认定自己不可能在此久留。心里总是不踏实，发空。在北京从来都是头一沾枕头就着，到美国这么长时间老是睡不实，应了小品里说的“大头朝下”，像出长差住旅馆，心不能放在肚子里。此时，家是多么亲切！”

按说，此君真是幸运儿，在中央电视台干了没多久就被美国一大电视网选中赴美进修、工作，一家人办了身份。可他也有他的苦衷：“我在中央电视台时出去采访特自由，特随意，到各省都是招待甚佳，吃香的喝辣的，自己觉得挺是个人物。来美国，整个儿没了在国内的好感觉，等到需要找感觉的时候，感觉肯定就好不了了。总觉得进入不了他们的社会，不能跟他们成‘哥们儿’。”后来，他被该电视网派回中国做代理，才了却他“找感觉”一愿。

洛杉矶有华人50万，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众多文学、艺术、体育明星云集之处，春节拉起一台联欢晚会，其水准一点儿不在国内晚会之下。这里名人多，但到这儿就大多不再是名人了。似张爱玲那般享誉海内外的作家，直到死在寓所，她周围的邻居也不知她是何人。就在距丁绍光的豪华住宅几个街区的一家餐馆，我见到了几位大陆来的青年男女，背景各异，际遇不同，使我忆起赵丹、周璇主演的《马路天使》来，同样是捞生活的一群。

一位小姐，身材娇小，圆脸圆眼睛，是3年前从深圳来的，原先在一家外贸公司做。“出来是上学，后来一看机会这么多，能直接赚钱，就上不下去了，太苦。赚钱也不容易，还有东方文化的冲撞、对立。在这儿也觉得不好，但大家都不说，写信回去都说好的。想回去干事，可这么长时间跟那边脱节了，又怕。”

是在歌舞厅幽暗的灯光下见到她的，似曾相识。虽然韶华已逝，依旧体态冷然，一张雕刻精致的脸庞风韵犹存，只是神情黯然、颓丧，一副风尘憔悴状。听人说她是一位早年电影巨星之后，继父亦是军队高级负责人。她本人13岁参加空军的文工团搞舞蹈，近年还拍过电视剧，6年前赴美，嫁了人，又离了婚，现一个人带着5个月的女儿惨淡度日。看到旧日的时代宠儿今天沦落到在夜总会陪舞、陪唱，被出钱的人呼来唤去，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在KTV包间，在座的人都不忍心请她唱，她默默坐了片刻，点了一首《萨丽哈最听毛主席的话》，因为那是她小时候跳过的曲子。听着熟稔、亲切的旋律，一双忧郁的眼睛闪出些许亮泽。“我托人从大陆带来了《红太阳》盒带。”渐渐，她不再有戒心，对我们像是久别的故人，一声长叹：“我这几年，不

留在了美国，“美国情结”解开了，又生出了一个“中国情结”，这是许多人始所未料的。办绿卡、转国籍，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手续，然而，那一张黄土地衍化来的黄色的脸、今生今世无法改变，与那一方在老国度的血脉情缘，岁岁年年难以割舍。

冷战战罢，小小寰球有两大现象引人注目，一是因为全球面对共同问题而产生出来的一个全球意识，二是各民族不论在何种制度下掀起的寻根愿望和热潮。耐人寻味的是，留美华人恰是这两大潮流的结合体。地球成了小村庄，他们渴望异地的精彩，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到最大的发达国家。初时，他们或他们的下一代极力追求美国化，而没准什么时候，他们甚或他们的根本没回过故乡的儿女、孙子辈成年后又像当年前辈同样的热忱加入寻根的行列。

中国如此之大，华人移民在美国却是“少数民族”。而且是极“少数民族”，目前超过 200 万人，约为美国人口总数的 1%，在亚裔少数民族中位居首位。人数虽少，能量却非同一般。华人在参政上目前尚不及日裔，政坛上少有显赫的人物，然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均比其他族裔强。科学家辈出，华裔金头脑抢走多少美国科学家之风采。素来擅长经商的华人在生意场上纵横驰骋，异于凡响。美国虽说是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号称“民族大熔炉”，其成员间仍存三六九等之分，种族歧视是不争的事实。在排华法案废除了半个世纪之后，华人在美国，于某些地方比黑人还不如。白人对华人的轻视显而易见。许多华人才干出众，只因肤色的缘故，他们头上横着一块难以逾越的“玻璃天花板”，致使华人在企业中位居主管阶层的寥寥可数。一大批华裔科学家无法进入国家科学委员会，不是由于他们的资历或能力不足，而是政治地位不如人。李远哲教授所在的学校有一片为有成就的教授专设的停车场。一日，李远哲将车停在那里，待去取车时竟遭一白人的指斥：“你怎么能把车停在这儿？”李大为恼怒。当对方得知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方作罢。举世闻名的李先生尚有如此遭遇，一般人的境况不难想象。今日的美国各族裔间真正实现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益，还差得远。90 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危机复苏前后，从东到西掀起一浪又一浪排斥移民浪潮，反移民情诸日趋上扬，华人自是首当其冲。

去国辞家，人在洋邦，从此便难以摆脱异乡客的自我意识，随着种族歧视造成的心理负荷，去争取自己乃至本民族的生存空间。血脉相承，难题又“遗传”给下一代，带给他们更大的困惑。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通常被称为“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他们吃着美国的奶油面包，喝着可口可乐，看着卡通片长大，统统是美国文化，父母、祖父母要强接着他们去学中文，才勉强认得几个，还羞于出口。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他们身上稀薄之极。这些孩子从内心思维、行为举止全都美国化了，只徒有一副东方外表，黄皮白心，“黄香蕉”是也。而当孩子们悄悄长大，社会却把几乎不会讲一句中国话的他们称作“中国人”，另眼相看待，常常激起华裔孩子的青春期情绪反应，引出莫名烦恼。在学校里，白孩子欺负黑孩子，黑孩子又欺负华裔孩子，该怎么向他们解释？“黄香蕉”中的一些人待真正成熟后，首肯了自己的血缘，又可能渴望学母语，向往他的故国，他的生命之源，激扬起追根寻祖的冲动。

当远方的游子作为少数族群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时，他们从精神和现实两方面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民族背景来支撑。中国，便是海外 5000 万华侨的母体。悠悠数千年，“认祖归宗”至今是许多华人特别是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祖国富强了，起码可以使她的游子扬眉吐气，不再受歧视，不再被刁难，不再被不公平地对待。赶上中美关系恶化，

族感情往往变得更为激切，寻根敬祖之情常怦然于月夜心头。一位来美攻读国际法的朋友讲述了他做硕士论文的过程。题目是朝鲜战争，在当年的敌对国解答这个问题颇为做难。当时的联合国决议都是写着北朝鲜侵略、诬蔑中国等内容，倘按照在国内接受的知识去解答，显然是有逆鳞之虞。反复思忖，国家的尊严不可辱，他选择了后者。导师的助手看过论文十分为难，让他直接送交导师。没想到，这位教授阅后欣然打了满分。他说：“学国际法的人必然首先要有爱国主义，没有爱国主义根本不可能学好国际法。”可见，不论哪个国家都是敬重热爱自己祖国的人。华裔太空人焦立中曾两度升空在太空漫步。他出生在美国，是十足的“ABC”，但他对中国有一份珍贵的感情，他以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感到自己的根在中国。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后代，能步向世界科学的前锋，我是感到骄傲和幸福的。”

因为有了出洋移民的可能，现代人平添了一种诱惑和考验，“爱国”一词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真实、生动和恼人。在国内，大概只有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国旗班升国旗，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夺标的运动员冲着五星红旗淌热泪那一刻能掂出“祖国”的份量。平日里你我都是中国人，不存在他国就无所谓吾国了。而身处异域，“祖国”的概念由模糊骤然清晰起来，“我是中国人”的定位意识无处不在，甚至强烈到难以自持。笔者赴美后不几日，克林顿总统即宣布无条件延续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并取消人权与贸易问题的挂钩。消息一出，周围的中国人奔走相告，喜出望外，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问到国内对此事的反应，我说舆论上是低调处理，民间也没过多关顾，以为不过是每年的例行公事。他们马上说，这回可悬啦，差点儿就要永久性取消最惠国待遇了。为阻遏克林顿下决心，美国朝野各方纷纷施加压力，近800家大公司联名上书，在美的华人界也加上一个重重的砝码。我的一位教授朋友终日心急如火，在计算机联网上征集签名，短短几日，征到数千名。大功告成，为遥远的祖国出了一份力，给他们带来莫大的欣慰。难怪有人说，在海外的人有时比国内的还爱国。

此地远离中国，不见国土，不闻乡音，只剩下故乡梦了。莫如说，爱国是一种深挚的私人情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受，是一种看不见的追随。它并非一定要在大是大非面前凸现，更多的是在潜意识里涌动，流露于不注意的举手投足之间，在美国生存，谋求发展，做事不能不照美式操作，有意味的是，为数不少的华人却在生活方式上顽强地保留着祖传的一套，恨不得比国内城镇居民还更传统。铺天盖地的洋货、洋建筑已不稀罕，倒是那些土的俗的更能惹人动情。在国内的商店、餐馆越来越分不出国别的时候，美国的中餐馆照例是大红灯笼高挂，观音、弥勒虔诚模样，丝竹古乐回旋绕梁，做足了中国味儿。不少家庭喜迁就居后，要迢迢万里买上国内的条幅、中堂、剪纸做壁上装饰。不少为人父母者要求孩子吃饭时一手端碗一手持筷，在家里必须说中文，按中国的礼节，不希望有朝一日带他们返乡时有失礼的地方。上班是笔挺的西装，下了班会俨然一双圆口中式布鞋。还是吃中国饭，唱中国歌，说中国话，看中医，扎针灸，常常在家里请客，夜生活就是回家。独立节是美国最长的休假日，买便宜货，上街看游行，体验少有的热闹，待醒悟到自己是在为别人的国庆节而欢乐，又不免有几分扫兴。处于美国文化的重重包围下，众多的华人年复一年仍遵守着中国的许多传统习惯和礼仪，有的比本土还认真。

